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四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一五期 ——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08d)

【自由论坛】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三——爱国主义与文革 顾 土  
【春秋史笔】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文摘（之一） 周良宵·顾菊英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自由论坛】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三——爱国主义与文革

• 顾 土 •

百多年来，各种主义多如牛毛，但能够坚挺下来的微乎其微。有的是过眼烟云，有的是虎头蛇尾，有的是一时热闹，有的本来就莫名其妙，所以最终也不知其所以然。只有一个爱国主义，似乎可以穿越任何历史风云，始终处于最抢眼的位置。

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多端，人心怎样向背无常，爱国主义却始终叫座，成为任何一种执政力量最有力的精神召唤。面对来犯之敌，可以呼唤爱国主义；催发军国意识、鼓动纳粹思想，也不妨运用爱国主义；推翻一个政权，可以高喊爱国主义；维护一种统治，也不妨宣传爱国主义；打击异己势力，可以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树立个人威权，也不妨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号；坚持独裁可以自称爱国主义，推行民主也不妨叫做爱国主义；不顾人民死活，全力发展军火工业制造原子弹，可以说成是爱国主义；专心推进国计民生，也不妨视为另一种爱国主义。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是最狂热的爱国主义，而汪精卫、贝当也自认为是忍辱负重的爱国主义；以抗美援朝的红色高棉视自己为爱国主义，而借用越南力量摧毁嗜血成性的红色高棉也被看作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几乎成了鼓动社会情绪的灵丹妙药，百发百中的政治子弹。只要掌握了爱国主义的话语权，就足以鼓动起民众的力量；相反，只要被爱国主义不幸击中，也必死无疑。

爱国的国，究竟是指什么？如果是“朕即国家”的那个国，爱国就是效忠专制君主。假如是寡头掌控的国家，爱国就是拥护一个利益集团，而这个集团基本以少数集权者的意志为归依。国家也可以是我们从前常年接受的那种概念，叫做“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这样，爱国其实就是听命于这样的工具和机关。国家也可以是一种民主制度左右下的国家，爱国自然就是尊重这种制度。当然，爱国的国，更可以是祖国，祖国不是一个政权、一个机关、一个人、一个工具，而是文化、历史、土地、自然形成的一种特定范畴。一个人生长在这种范畴培育的文明中，不能不具有自己的归属感。我们的祖国已经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从未间断，而现在，“祖国华诞”、“祖国生日”一类的说法随处可见。看来，在很多人心目中，国家与祖国已经融为一体。有一种时兴观点就认定，祖国与国家不可分离，所以，爱国兼顾两者。这种观点大概属于“有奶便是娘”主义，或者叫“给什么爱什么”主义，生出来撞上法西斯就爱法西斯，碰上民主就爱民主，遇见专制独裁就爱专制独裁。

爱国主义，之所以历久弥坚，在于所有的主义中只有这种主义最空泛也最没有实质内容，可谓伸缩自如，来去恣意，变幻莫测。时代不同，爱国主义也可以不同，内涵甚至截然相反。今天的卖国主义或许就是明天的爱国主义，昨天的爱国主义，可能就是今天的卖国主义。可以说，任何人任何势力都可以以此为招牌，塞入自己的内瓢。

翻阅世纪史，可以清楚地看见，悲壮英勇，无不以爱国主义为支撑；邪恶血腥，也无一不是狂热爱国主义的结果。以文革为例，这一中国历史上的深重灾难，从头至尾，几乎都处在爱国主义的躁动情绪中。

## 一.

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爱国，多半都是今人封赠的，其所谓国实际就是君主的家天下，忠君与爱国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因为那时的国家不如称之为家国，是一个人及其家族创立并统治的地方，生长在这样的地方，有如纳粮交税一样，当一个忠诚的臣民是份内事。其实，即便是这样的忠君爱国也经不起理性推敲，只能含混说说而已。春秋战国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包括孔夫子，都不怎么忠于自己的家国，朝秦暮楚是他们从政的特征，今天为这个家国出谋划策、明天又为那个家国出征打仗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像屈原那样的爱国，主要含义都是后人层垒地加上去的，因为在屈原的时代，根本就没有卖国这一说，不然，伍子胥算什么？北宋的杨业一直被认为是爱国的忠臣良将，其实，他也是个叛将，只不过随着北汉君主一起投降，因此就没人追究他到底爱不爱国或是爱什么国了。杨业之前还有苏武，之后还有岳飞，其爱国也特别为后人所称道。这一类的爱国，在于他们抵御的是异民族入侵，处在战事纷扰之际，假如当时异民族已经主导天下，或者少数民族已经成为中原一个朝廷一种政权后，在他们的统治范围内，不论汉人如何献身，都不会有人再追究他们的爱国与否。北魏时大权在握的冯太后，满清入关前就已经成为重臣的范文程，清王朝的那么多汉大臣，从来都是正面人物，没人称他们为“卖国贼”。

与忠君式爱国相辅的观念是：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这样的家国观也为王朝的更迭带来合理依据。可以说，古人看重的是节操，鄙视的是贰臣，而不是政权本身。

中国传统的爱国，并不排斥借助外来势力，甚至可以用土地、赋税、人口等利益为代价。自先秦一直到民国，直至1949年，这样的事例史不乏书。对立的双方可能都向外来力量示好，都会签订或准备签订出让民族利益、臣民利益、家国利益、国家利益的条约，以换取外部军事、财政、政治的支持。其实，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历史上也都有类似的情形发生。清季以降，中国固有的那种并无明确界定的忠君式爱国，又与外来严格的近现代国家观念混杂起来，

变得极为难解。在传统式爱国仍主宰着人们思想的同时，国家的主权、领土等事关国家利益的理念也传入中国，这使得在朝的当权者从实际需要出发而产生的外交行为，与在野的现代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从近现代国家理论着眼而形成的爱国舆论相对抗，不断爆发冲突。

进入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涌入中国，与传统的忠君式爱国、近现代国家观念相交错，让中国人的国家思想更加芜杂，也更为无所适从。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社会变革理论，以世界大同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思想，置阶级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将消灭阶级和国家作为最终目的，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让救亡图存中的许多革命志士常常陷于矛盾的心理中。在对待苏联扩张，对待外蒙古独立这样的问题上，显得难以自圆其说。近代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爱国、卖国又与意识形态相交融，让国家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国初年，背叛共和、赞同复辟，也叫卖国和叛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反共与反华紧密相连，不同政见与出卖国家利益难解难分。

1949年以后，忠君式的爱国被发扬光大，近现代国家的概念由于执政的原因也被执政党所接受，而深受苏联与共产国际影响的社会主义阵营观念和反帝意识以及随后的反修思想则左右着对外关系，作为建党宗旨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建党理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绝对占据意识形态。在这固有与外来，传统与革命，最终与当下的混合思维中，执政中的矛盾性时常显现出来，只好此一时彼一时。今天可能讲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共产主义的大目标，明天兴许又讲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后天说不定只讲无限忠于，就如《东方红》和《国际歌》常年唱在一起那样，经不起逻辑推敲和理性思考。不过，那个年代，缺乏的恰恰是理性。

文革中近似癫狂的爱国主义，正是处于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

## 二.

文革是一场针对所谓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但是，当对外国和对外国人的各类行动以爱国的名义出现时，人们就很难辨明其实质。所以，反省文革，往往会遗漏其对外的部分，也不能公正判断那些对外行为的是与非。其实，文革的对外与对内完全一样，都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什么都以阶级划线，而这些所谓阶级的分界又是绝对的主观意志，主观中时时还暗藏着强烈的领袖欲望、排斥异己的心理和残酷的权力之争。文革中，在对外问题上同样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尤其是文字和口头给别人加上的莫须有罪名并不亚于对内，只不过因为事不关己，国内的人们不怎么重视罢了。文革对内对外的政治运动始终交织在一起，帝修反是国内阶级敌人的总后台，国内阶级敌人则以国外帝修反为依靠，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思维，上下一致。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威胁，是文革的基本话语，文革中的爱国主义，主要就是反对美帝反对苏修，与文革相始终。反帝反修既是日常斗争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任何重大政治事件的主要内容，有单位或群众组织的批判会，有大规模的街头示威，也有体育馆、体育场、广场的万人、几十万人直至百万人的浩大集会，一浪接着一浪。全国人民狂躁地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不仅可以借机大肆发泄情绪，更在于唇齿相依是当时人们认知印度支那问题的一种思路，中国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也是当时的流行口号；反对苏修的理由之一则是苏修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亡我之心不死”。

帝修反中的反，即“各国反动派”，也是文革不时攻击的目标。其中有的起因于边界问题、华侨问题，也有的因输出文革和输出革命所致，既属于意识形态，也属于国家间的实际纠纷。由于文革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这些矛盾也不能不一概打上浓重的阶级斗争烙印。英国、印尼、缅甸、印度等国家在文革期间曾与中国闹得不可开交，其中只有英国算是老牌帝国主义，

其他都是发展中国家，或者叫第三世界国家。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领袖，缅甸也不是资本主义，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矛盾，文革初期有时其激烈程度超过了美苏，我就曾亲身经历了反印尼反缅甸的大示威，壮观景象不逊于反美反苏。原因在于与这些国家发生矛盾时恰好赶上了中国民众正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一些政坛新秀和舆论工具又想趁机显示自己的爱国情怀和反对帝修反的决心，所以这些国家暂时就成了爱国的排他对象。由于发生的矛盾属于一时的对抗，所以持续时间也不长，很快又被下一轮行为所淹没。昨天的反动派，或许又成了今天的“老朋友”，这是文革中的常见现象。反动派的内涵，也类似文革中的“坏分子”罪名那样，无一定之规，更像是个筐，今天可以装这个，明天又可以放那个。

文革是以所谓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依据而不断延伸发展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以及被再次揪斗的彭德怀等所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同时也都被定性为帝修反在中国的代理人，批判他们正是为了爱国，所以，对他们的批判和斗争，始终贯穿着爱国主义的情绪。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革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作者戚本禹是文革初期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炙手可热，他的这篇文章就是对刘少奇发动全面攻击的总动员令。林彪最终以叛逃苏联定罪，批判以他为首的所谓反党集团自然也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彭德怀与苏修“勾结”的罪行则是他在文革中又遭批斗的原因之一。文革后期，1974年9月的“风庆轮事件”是攻击邓的一大理由，说他执行的是一条“孔孟之徒的卖国主义路线”。其实，整个文革中，卖国主义一直是一顶大帽子，专门用来整人，爱国主义则成为自我拔高的工具。1973年11月，根据毛泽东授意，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周恩来等人，说中方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态度软弱，是“投降主义”、“丧权辱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1974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称：“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矛头实指邀请安东尼奥尼访华的中国领导人。1974年2月，中国彩色显象管生产线考察团接受美方玻璃蜗牛礼品被怀疑为“辱华”，成为有名的“蜗牛事件”。1974年6月，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接连批示，指责从国外买船的人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耐人寻味的是，到了华国锋时代，对待“四人帮”的批判依旧沿袭了文革的方式。其间就有人认为，江青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战略特务”，而过去这个罪名则是王光美的专属。

除了批判、攻击式的爱国主义登峰造极外，在文革中，歌颂式的爱国主义也达到颠峰状态。任何一项发明、创造和生产成就，直至体育竞赛成绩，都被形容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曲凯歌，是自力更生的辉煌成果，是为国争光。比如断肢再植、100万伏超高压标准电容器、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万吨级远洋货轮、3200吨破冰船、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氢弹以及抢救心脏骤停29分钟病人、拦海造田和填湖造田、攀登珠穆朗玛峰等等，好像是任何“好事儿”都可以算在爱国主义的账面上。

文革中的爱国主义，依照当时发表的各类文章的说法，其历史上溯接轨至太平天国、义和团和五四大游行。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里，戚本禹尽其所能地颂扬义和团的“灭洋”行动，论说甚至已经脱离了左翼历史学家的思维框架，一些观点也超出了文革前有关义和团的评价。这里不妨摘出几段：

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

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有的吓得躲进棺材，雇人吹打着，企图逃出城外。

一九〇〇年的六月，义和团的革命活动达到高潮，京郊各县的义和团三五十人一队，不分昼夜，一天数十起地涌进北京城内，守卫城门口的士兵，向他们致敬礼，为他们喝道让路。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前门外打磨厂等处的铁铺里，炉火熊熊，日夜不停地为义和团赶制各种刀枪。

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撼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

读了这些文字，我们已经分不清他说的究竟是红卫兵造反派还是义和团了。看来，红卫兵造反派正是义和团的嫡传，文革则是近现代史上一切排外反外的延续。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反帝路”、“反修路”等新路名就产生自文革；声势最为浩大的反帝反修示威活动，用极端方式批判外国的文章，也是文革的产物；大量烧毁禁绝“封资修”书籍是文革的主要内容，而其中的资与修，指的正是外国；1967年8月，北京万余人闯入英国驻华代办处院内一通打砸并纵火焚烧，更是文革中轰动世界的事件。文革中，曾经留过学的、去外国工作过的、与外国人结了婚的、由外国来华工作和生活的，甚至与港澳这两处沾了外国边的地方有关系的，还有信教的，几乎都被扣上“特嫌”的帽子，有人被关押，有人遭批斗，所有人的亲属均受株连，这与义和团时期也是如出一辙。

忠君式的爱国，在文革中也上升到极致。在反帝反修的巨大浪潮中，忠于伟大领袖、捍卫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目标；批倒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代理人，也是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所有批判无不以最高指示为依据。保卫毛主席就是保卫中国，捍卫毛泽东思想就是捍卫祖国，这样的思维逻辑，在文革中是举国公认的。

### 三.

文革中的爱国主义，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在文革中被不断强化。“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和“读点马列原著”是最高指示，所以，马列学习班、马列学习小组在那个时代，尤其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多如牛毛，在全国各地非常时兴；而且，在书店和图书馆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述与注释也是允许阅读的主要内容。我在读初中以后，就被吸收进马列学习小组，经常在课余时间所谓的积极分子同学一起阅读原著，有时还有政治老师辅导。究竟读懂没读懂姑且不说，但那些说法却深深印在脑海里。比如《国际歌》的歌词，比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比如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比如工人无祖国，比如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实现世界大同，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无产阶级不应该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特别是列宁从“资本主义崩溃论”出发，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应该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积极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并及时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甚至提出“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方针，以便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危机乘机夺取政权。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会被很多人指斥为卖国主

义，可在那时却是我们信奉的真理。

一方面是躁动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是真理式的共产主义，这两者能够被有机地整合起来，应该归功于当时奉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爱国主义虽然狂热，但还是无条件地统一于这一理论框架之内。反美的最终根据并非只是美国妄图干预我国内政，试图侵犯我国领土领空，将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而是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子，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死敌，是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对立面。反苏也不仅仅是苏联虎视眈眈，觊觎我国领土，妄想控制我国，而是因为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头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叛徒。所以，无论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威胁或牵涉到中国政权，都成为当时攻击的靶子，比如美国在亚非拉的一系列政策和行径与中国并无利害关系，却遭到中国猛烈的抨击、激烈的反对。以色列并没有将中国大陆政权作为敌人甚至不断主动向中共政权示好，但中国却将以色列纳入了美帝国主义体系，因而对以色列从不领情，所有的涉外讲话、社论、政府工作报告，包括新年献辞、春节贺词、国庆招待会祝酒词，都会将以色列骂上两句，“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最熟悉的话语。而以色列的对立面，不管与中国的切身利益是否有关，也无一不受到中国热情全力慷慨的援助。对待苏联的态度也是如此。由于苏联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是革命的叛徒，人们对待叛徒的仇恨往往比敌人还要强烈，于是，几乎所有反苏力量都相继被纳入自己的战友、朋友、盟友的行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远在天边，尽管与中国那时的国家利益毫不相干，但因为反苏或不完全听命于苏联，就受到热烈追捧，被认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惜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确立牢固的同志关系。各国共产党、社会党、工人党内部分裂出来的势力，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只要反苏，也一概如同亲人一般，非但金钱资助、舆论支持，而且来华访问时待若上宾。凡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澳共（马列）主席希尔同志，这样一个在本国在世界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力的人，与中国国家利益完全不搭界，就是因为所谓的坚持马列、反对苏共，拥戴毛泽东，结果在中国家喻户晓。为了对付美苏这两个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也为了确立中国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当时的中国还动用大量资金和武器支持、鼓动世界各地的武装斗争。结果，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东南亚各国，因此与中国关系十分紧张，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但却符合世界革命的大目标。如果当时的中国是个富裕国度，有能力拿出闲钱去做这些事情，也还罢了，犹如美国那样，即使有苏联那样的条件也还说得过去，但中国人民当时正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自己经济拮据，却用资金去支援别人；自己没多少铁路，却无偿地把铁路建到了别的国家。这恐怕不好说是“爱国”，只能用意识形态来解释。

其实，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做法，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定型，只不过文革是意识形态的极端时期，因此显得更为突出，更为偏执。文革前，文革期间，对待一些国家，由于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关系，是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是同志加兄弟，是老大哥，所以在边界问题，在领土争端，在体育竞技中，什么事情都好商量；而当这些国家被认定是修正主义，或者对修正主义态度暧昧时，又不妨再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以至与之水火不容。

今天，爱国主义依然是全社会最为盛行的主义，有时看起来似乎已经成为硕果仅存的主义，其狂躁外表与文革一脉相传，其随意随机性却强于文革，其非理性则比文革更胜一筹。这是因为，文革期间的爱国主义始终局限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框架之内，一直被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所左右，没有背离共产主义大目标的论说范畴。在文革中间，那些爱国言行，看起来似乎比今天更为激烈，但是，其最高掌控能力却远远超过现在。没有人会说美国人如何，法国人如何，苏联人如何，永远将美帝国主义、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苏修、勃列日涅夫和广大苏联人民分得清清楚楚。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其他疯狂的排外行为，当权者曾竭力制止，相关责任人事后也都遭到严厉惩处，还被公开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红极一时的王、关、戚也因此失势，身陷囹圄。那时没有人敢说个不字，更没有人胆敢讨论这是否是卖国或是对帝国主义态度软弱。

值得研究的是，尽管文革期间，经历了抗战爆发三十年、抗战胜利三十年等重大日子，虽然中日后来交恶的各种原因都存在，但中日友好的呼声、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呼声，始终高于其他声音。日本从来没有被当作主要抨击对象，至多只说一句“美日反动派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那时的宣传从来不提什么“南京大屠杀”，许多中国人更不知道什么“慰安妇”。

在文革中间，我们知道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语录：“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但是，这一论断现在也不见有任何人重新说起了。

□ 原载《记忆》2009年19期

~~~~~  
【春秋史笔】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文摘（之一）

• 周良宵 • 顾菊英 •

第一卷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

〔按〕吴晗（1909年—1969年10月11日），明史学家，抗日战争期间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写过一本“讽世”的历史传记《由僧钵到皇权》，又名《明太祖》，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同时他还写过许多借古喻今的短文，抨击当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辑为《历史的镜子》一书行世。中国的文人，借古讽今，借古喻今，借古颂今，是传统的积习与常用的手法。解放以后，吴晗长期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民盟领导人，又是历史学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深为毛泽东所看重。历史学界的几樁大工程，如标点二十四史等，都是毛泽东交他牵头举办的。1956年吴晗加入共产党，仍兼民盟领导人。他自认为《明太祖》一书“指桑骂槐”，缺乏历史主义态度，于是另行改写，1955年写成了《朱元璋传》。对朱元璋作为农民革命领袖，一反过去的讽刺与谩骂而大加吹捧。这本书明显的涉有借古而歌颂毛泽东的痕迹，用了同一根马刺，昔以刺马，今以拍马，很惹人注目。书成，江青即向出版社索走样书，传闻有所指责。这本书也就长期被封存，直到六十年代初又定为“内部发行”，始稍有流传。（1）吴晗写海瑞，也是借古喻今的奉命之作。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有感于当时风靡全国的说假话、空话，不敢坚持真理、原则的歪风，提倡大家学习明朝的海瑞那种刚正不阿、犯颜直谏的精神。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在军队干部中传达《工作方法十六条》（即毛泽东在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时，就谈到毛泽东要求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社会的人物都不如。”“在封建社会，还有海瑞这样的人，不怕杀头，敢于批评嘉靖皇帝。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就是怕失掉选票，就是没有这种勇气。这个故事很深刻，后人写了海瑞传，叫做《大红袍》，就是写海瑞的故事。主席把这本书介绍给周总理看。主席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只报好事，不报坏事，去年的浮夸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有严重问题不报上来，报上来的都是好的。如果根据报上来的情况制订方针政策，那就危险得很，就会犯大错误。”（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178—179页）。根据毛泽东在上海这次讲话的精神，钱俊瑞和胡乔木都曾来找过吴晗，说你是明史专家，对海瑞很有研究，应当写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于是，从1959年6月到9月，吴晗连续写成了《海瑞骂皇帝》、《海瑞的故事》、《清官海瑞》、《论海瑞》等四篇文章。1959年底，又应北京京剧团之请，把有关海瑞故事的提纲送交剧团。经过几个月的修改，吴晗关于海瑞的文学脚本和北京京剧团王雁的舞台脚本

才定型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1年2月正式公演。当时在社会上并未引起强烈反响。（田耕：《〈海瑞罢官〉导演谈〈海瑞罢官〉》。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此剧上演后，毛曾在家里接见了扮演剧中海瑞的马连良，称赞吴晗写得成功，说马连良演了一出好戏（苏双碧等著《吴晗传》；叶永烈《姚氏父子》）。但是到1962年3月上旬，江青提出要看此剧，看过之后，就不准再演了。

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当时会上有许多干部将彭德怀比作现代海瑞，并认为毛主席和嘉靖一样，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426页）江青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支持彭德怀的。这一年，江青曾以个人名义找中宣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要求批判《海瑞罢官》。毛自己也曾说再三找人，均被拒绝。可见阴谋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已经开始。1964年下半年，江青又找过李希凡，但李不肯接受。江青去上海组织文章批判吴晗是在1965年春节过后不久，66年2月8日彭真等人到武汉向毛汇报时，毛曾亲自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可见批吴晗是毛一个策划已久的密谋；而批吴实意在动摇彭真，并由此而直指彭真的后台刘少奇。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报告就坦率地承认：“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姚文元文章把吴晗问题与1961年的所谓右倾思潮联系，无疑是江青的授意。但毛泽东稍后才亮出底牌，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彭德怀鸣冤。这就使吴晗的问题再次升级，由右倾思潮上升为反毛宗派活动。很明显，最早在姚文中为吴晗所扣的右倾思潮帽子，还只是毛所精心策划的投石问路手法。批吴是作为倒刘的突破口设计的。

吴晗看了姚文，心中不服，他在11月14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的。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这段话载于《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2期，标题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后的反映》。毛泽东看了此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但是对吴晗还是照批不误，而且不断升级。（田耕：《〈海瑞罢官〉导演谈〈海瑞罢官〉》）。

## 第二卷（山雨欲来一毛、刘矛盾的发展）按语：

毛从什么时候与刘开始出现重大分歧、并使他下决心撤换刘的党内第二号人物权位？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一书曾提到：根据资料和毛自己的说法，大体上是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说，他发现刘少奇有问题是在1962年。《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毛主席最早觉察到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是1962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1970年访问中国，同毛泽东长谈之后，写了一本书叫《漫长的革命》，其中说：“一九六二年以前，刘少奇个人没有公开反对过毛。但是——一九六二年，在党的会议上，毛的三面红旗，受到刘的批评。”（第60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则认为：“毛发动文革的念头由来已久，其心路历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的斯大林之死。”（第86页）而长期工作在毛泽东身边，对毛泽东深有了解的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则肯定毛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不满是在56年八大反个人崇拜，抹去了党章中有关毛泽东思想指导的词句开始。我们以为这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即使说是一种矫情伪饰的伪装也罢，其表现还是比较谦虚和大度的。刘少奇对于毛也是忠心辅助，事事紧跟，关系是和谐的。“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捩点，毛觉得中央领导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2）毛于是怀着一种报复的心情，宸衷独断开展了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反修反苏等一系列运动，以张大个人权威。然而，在实际面前，他这一连串独出心裁的设想和作法都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挫败，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1957年的反右是对所谓“双百万



针”的自我讽刺。“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是狂妄无知的毛式经济空想追求的彻底破产。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实际上并没有为毛自己带来可供慰藉的效果；恰恰相反，反而使自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蒙上污垢。毛是在接连碰壁的情况下，十分不情愿地实现他久已（56年）提出的冠冕承诺，勉强退到第二线上来的。他留下来的是一屁股屎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是封建专制政治传统塑造成的最好管理、最驯服的羊群。只要有不为己甚的扰农、有最低水平的温饱、有可以做“太平犬”一样的最起码的安定，“民亦劳止，迄可小康”，历史上的文景、贞观等治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在疮痍满地的废墟上建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还有邓小平所执行的仍然只是不扰农、稍宽松的传统“仁政”，中国便又一次奇迹般地在全民饥饿中复苏了过来。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不能不作出检讨，对极左的空想蛮干所造成的后果羞羞答答地承担了责任。而刘少奇则因为在三年困难时期支撑有功，成了以稳健和正确而为众所服的英雄。这对正处在自我陶醉颠峰的毛是最难堪的羞辱。这以后，毛便在不甘冷落的挑剔情绪下指责当政，愈来愈左甚至愈来愈不近人情。刘和他的同志们在实际工作中，当然只能把毛的这种过左言词当作牢骚来应付，于是在表现上愈来愈对毛敬而远之，把毛当成木偶高高供起，实际上则自行其是。（3）终至于在1965年初，以四清为导火线，毛刘矛盾事实上已公开化，毛已决定搞掉刘而重掌国柄，夺回失去的最高权力。这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用心和奥秘。当然，毛、刘的分裂也渗杂着许多复杂的分歧和矛盾，如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各种理论斗争、对个人崇拜问题的争议、中苏争衡的纠纷，以及政治权力的赌斗。这些问题都需要历史学家从多方面来进行深入研究与说明。不过，这里，我们还想从根本上指出：在中国这种有着斯大林极权模式和自己根深蒂固的封建家长专制传统的国家里，在个人独裁与个人崇拜的风气已经盛行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权势甚至已超过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专制皇帝。极权和家长专制就意味着不存在权力有一丝一毫的分散，不容忍他人一星半点不同的意见。更加容不得任何人分享或动摇他的权威。自古兔死狗烹，功高被杀的例子比比皆是。特别是权臣功高震主，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共产党的专制独裁是中国极端专制主义皇权的进一步发展。权力的争夺和权力的集中，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两片永无停息的转动磨石。刘少奇的挨整倒台，从这一角度看乃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方式与结局如何，难予预测而已。就以建国以后为证，随着毛的威望与日俱增，其个人独尊，不容歧见；猜忌旧日的战友与盟友，翦除恃功而不驯的同僚；以及追究前嫌，睚眦必报的事，已接踵发生。1953年12月处决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在此之前的9月还对梁漱溟大张挞伐，意在镇胁党外长期合作的民主人士。1955年中，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批判了邓子恢的右倾。1956年对周恩来、陈云在“反冒进”问题上发起攻击，迫使他俩认错检查。1957年制造反右派运动彻底整垮党外民主势力。1958年借批判军事教条主义为名，使刘伯承、萧克等一大批高级军官蒙受屈辱。1959年庐山会议，以极端蛮横的手法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联盟”。毛在批判彭等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竟屡次当面对朱德进行羞辱。1960年谭政以放弃部队政治思想教育的罪名而被黜，1962年，指小说《刘志丹》为反党而使仲勋等受株连。同时，邓子恢最终被撤除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1964年李维汉以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罪名被罢去中央统战部长长的职位。王稼祥的国际联络部部长职务也被撤去。1965年陈云因1962年的“右倾”而再次被迫检查，文化部也进行改组。1966年初，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打倒，乌兰夫受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斗争的同时，陶铸垮台，谭震林、陈毅、李富春等一批勋臣、老帅被打成右倾分子与“二月逆流”的罪人。贺龙被迫害致死。即使是由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林彪、长期倚重的笔杆子陈伯达，也终于被翦；周恩来则一直在被他准备好的自首叛变（即所谓“伍豪声明”）帽子威胁下，如履薄冰，而卖命输忠，以求自保。在毛泽东身上，斯大林与朱元璋的鬼影，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到。因此，我们说，毛必除刘，这是个人专制政权下无可避免的逻辑结局，什么“理论”、“路线”、“意见分歧”，乃至通外嫌疑、历史污点等等。都只是胜利者根据需要，可任意制造出来的罪名，原不需要历史学家过多看重的。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以马列主义理论家与共产主义理想家的面目出现的。在他纵横捭阖，娴熟地运用政治权术，斗争同志、剪除勋臣的时候，总是用一种貌似极端革命的理论作外衣，借以欺世惑众的。这就是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所谓毛泽东思想——外国学者也称之为毛主义——的内容，从思想哲学的角度看，美国学者 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包括唯意志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这大致是不错的。（4）归结到一点，就是封建的农民意识。因此，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农民化的马克思主义，他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革命问题是农民问题。所谓“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便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为农民革命的理论。（5）农民革命可以推翻一个旧王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农民革命永远也不能创造一个新社会。如果说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理论本身便带有乌托邦主义的色彩，那么，毛主义则是更加落后的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的变态。它可以打翻蒋氏王朝。但是，在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上，毛也同样跳不出历史上农民革命失败的覆辙。毛的经济理论实质上不比历史上的农民领袖们进步多少。他的所谓“大跃进”是对现代经济极端无知的蛮干：所谓“人民公社”则是直接导源于“五斗米道”天国的理想。在中共中央制定人民公社的讨论中，毛亲自注释了《后汉书·张鲁传》，作为文件，分发与会者。这个狂悖的土共产主义追求虽然失败了，但他并不甘心。他决心要把旁落的权力夺回来，从更深、更广的层次来推进他的理想，即所谓“文化大革命”。要一举革除所有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刘少奇作为一个务实的党务领导者，和毛泽东在思想作风上是有所不同的。在紧跟毛泽东而取得反蒋战争胜利的情况下，他们俩人之间很可以相互配合，少有矛盾。但随着毛泽东社会主义蛮干的加剧，刘已多次暴露出在关键问题上的被动。等到毛横暴蛮干明显失败而刘少奇以正面人物出现来为他收拾败局时，两人的分歧就暴露出来。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除了书面报告外，还作了口头报告。他说：困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引起的。全国有一部分地区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他认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套。他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对错误的原因，刘少奇分析：有经验不足的问题，但也有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作风。他还讲：彭德怀同志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人民公社，刘少奇明确指出，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会上，彭真对毛也进行了露骨的批评。这无疑对毛泽东的自尊自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此，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对这次会议仍然是耿耿于怀。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里，他明确指责了“1962年的右倾。”这里的“右倾”，主要是指刘少奇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说的。江青在文革初也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廖盖隆：《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可见其积怨之深。

从此以后，毛就结束了从59年开始的退却而为进攻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在理论上，修改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提出了所谓过渡时期的理论。同时他利用并鼓励林彪，大肆宣扬毛泽东思想，推崇个人崇拜个人迷信。

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是毛发起进攻的开始，他撇开原定会议的主题，出人意外地提出“阶级”、“形势”与“矛盾”等问题，并提出批判“黑暗风”、“单干风”与“翻案风”。他声称：《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所写的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的理论已开始了近乎180度的大转弯。在随即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同时，在康生的提示下，指李建彤（刘志丹之弟刘景范的夫人）所写报告文学《刘志丹》一书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活动。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他宣称：“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

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紧接着，毛泽东越来越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神经，几乎触目都充满了严厉的阶级与路线斗争的幻觉。阶级斗争的狂热，加上对自己退居二线之后所受到的冷落更激起对权力的炽欲、死后的担心等因素发展为对现实的恼怒。他决心及早行动，把权力夺回来。于是，他像一个被激昏的臆症狂者，对中央的一些负责人与部门，多次进行了左得不可理喻的辛辣、而且恶谗的指责与批评，并对某些情况有意夸大，危言耸听，以制造舆论。下面，我们按时间顺序，尽可能地就这些方面作一些摘引，以见一斑。他说：

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9日）

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评》1962年8月12日）

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

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在杭州召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毛泽东提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还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实验学会在企业 and 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不难解决。这是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新人的伟大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作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跟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的好干部。

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国家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更大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1963年5月20日）

我们这些国家如果不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不同右派和修正主义划清界线，那么，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会出赫鲁晓夫。（《与金日成的谈话》1963年5月30日）

你们（指河北）跟湖北差不多。湖北同志讲他们（那里被篡权的基层）是占三分之一。有的土改就不彻底，有的后来变了，有的是富裕中农当权。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不是社会主义的。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牌子，实行他们的一套。（《在邯郸与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等的谈话》196

3年6月14日)

现在在农村还有近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的手里。(《与日本共产党来访者的谈话》1963年8月4日)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的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1963年9月27日)

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1963年11月)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话剧、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对柯庆施同志报告的批示》1963年12月12日)

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指中共中央联络部。1962年初中联部长王稼祥就国际情况与对外方针提出意见书，被毛认为是与国内“三自一包”相配合的对外修正主义路线)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李维汉在1956年曾有五年内消灭阶级，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之说。1962年已受批判)。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一股风，即三和一少风，单干风等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与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尔科克斯的谈话》1964年2月9日)

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和，就象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上半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是工作会议(指北戴河会议)，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都来参加，把这些问题都抖搂出来了。然后又开了中央全会(指八届十中全会)，开了两个月，八月到九月。这个会议开过以后，这些犯错误的同志都检讨了，说自己不对了。有一个同志是主张三自一包的，就是邓子恢，他是长期搞农村工作的，是农村工作部长，是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回事。……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与金日成的谈话》1964年2月)

就在那年(1962年)八月，我们讨论了整个路线，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开了一次十

中全会，发表了十中全会公报。当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即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作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三自”。还有一包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中央联络部部长就主张三和一少。他本来害病。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此外，还有统战部，一部分人主张把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在几年内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只是两个例子，其他还不止。中央各部、各个部都不是太平的。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在武汉接见日共袴田等的讲话》1964年4月10日）

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会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北京（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老搞洋人死人，我们的国家要亡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6月6日）

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6月8日）

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6月8日）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在十三陵的重要讲话》1964年6月16日）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对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的批示》1964年6月27日）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1964年7月14日）

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案：即毛远新就读的哈尔滨军工大学）就有。……哪里都有反革命！……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吗？你们学校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与毛远新的第二次谈话》1964年8月）

现在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者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路线、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四清”、“五反”这个政策产生出来，还要谢谢广东的一个反革命，他写信给某某和某某，要我交出政权、军权。（《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资本主义，为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这种情况再过几年可能会在你们国家出现。（《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摘录）1964年10月16日）

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齐燕铭也不好，听说他是你（指周恩来）的秘书长（当时齐兼任文化部副部长）。这个人不能当秘书长。你还不如到解放军找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整个文化部都垮了。（《在听取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的插话》1964年11月26日）

1964年12月15日至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作会议，总结和研究社教运动中的问题。早在11月底毛泽东在听工作汇报时，就心怀叵测地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作主席，作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当时，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刘少奇不同意都看成是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有什么问题便解决什么问题。毛则认为运动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议由邓小平主持。邓曾提出：毛身体不好，劝他不要参加。毛坚持参加。12月20日在中央常委讨论时，毛与刘就发生分歧。毛强调要整“当权派”。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刘少奇问：怎么讲主要矛盾呀？毛泽东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嘛！五大领袖嘛！你五大领袖不是当权派？刘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多种情况是有工人出身，在立场、经济、组织上四不清，他们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被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主当了权的，还有已经戴了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当了权的。毛驳斥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没有希望。12月27日毛又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刘少奇不同意提一个派。他并没有直接反对毛的说法，而是提出：有人说有两类矛盾交叉，情况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毛听了很不高兴。第二天，他又讲话，说：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会后几个老同志找刘少奇谈话，批评他不该插话，对毛主席不够尊重。后来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刘少奇作了检讨，但毛不满意，认为刘少奇的问题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此后在会议的第二阶段，毛连续批评刘少奇。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重选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当天，毛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小会上批刘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15000人搞一个县，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1964年8月根据刘少奇的建议，集中大批干部，可多至万人，同时在一个县内搞四清，得到了毛的同意）1月13日，毛同一些省区的负责人谈话，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有听到反映。1月14日，毛在大区书记会议上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第一个十条，为什么刚过了三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毛还批评了北京

有两个“独立王国”，一是邓小平和书记处，一是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参考《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01—604页；《文化大革命论析》第65页）

到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四清”，（毛）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邓小平文选》第260页）

我们必须有严格的秩序，必须有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谁呢？就是刘少奇，我是他的附臣。（64年12月20日讲话）

我们这个国家有些好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譬如文化、艺术、教育方面，现在刚刚触动它们之中的一些坏东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不接受，不然我们就没有知识分子、没有教授、没有教师、没有新闻记者、没有艺术家。那些人就信他们的，不信我们的。我说那些人叫做坏人。他们有他们的爱好，崇拜死人和外国人，外国人也是死外国人。他们崇拜西方国家的古典作品，看不起自己，总觉得自己不行。这就是一个教训。（《同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的亚非作家的谈话》1964年12月25日）

“他们把我看作死去的祖先。”（《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第54页，时间不详）

“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作大了，骄娇二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阶级。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五、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同上第59—61页，64年12月26日）

“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同上）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不时地吹到社会主义国家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转引自周恩来《人大三届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65年1月1日）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跌到斜路上去。（《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月）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为、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1965年1月29日）

“这次运动（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

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年1月14日）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15%的人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6月26日）

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7月）

毛主席：……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马尔罗：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主席：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这些是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

马尔罗：为什么有作家？

毛主席：有一部分作家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把旧的摊子都接受下来了。我们原来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谈话记录》1965年8月3日）

修正主义是一种瘟疫。1962年在国际上、在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是王稼祥。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是陈云，而且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四年才会恢复，解放军才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1962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顶不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关于诱敌深入及援助越南问题时的谈话》1965年8月11日）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9—10月）

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在去华东路过济南在火车上的谈话》1965年11月）

（在汇报中谈到大学生一毕业就分配到机关，没有经过锻炼的时候）。毛主席说：就是这批人出现修正主义。（《在听取某某某同志汇报时的插话》1965年11月）

在这一段时间（1962—65年）里，对文艺、对学术的批判，也在各个领域内紧锣密鼓地展开。它们都是由毛泽东直接导演或直接利用的。



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江青随即组织批判，对孟超的《李慧娘》与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有鬼无害论”大张挞伐。“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1964年8月14日，根据康生的指令，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在全国广泛放映批判。并说：“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于是，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红日》、《舞台姐妹》、《兵临城下》等、戏剧《李慧娘》、《谢瑶环》、小说《三家巷》、《苦斗》等许多文艺作品横遭批判。这时的江青，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一名被毛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哨兵”。1965年4月，文化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结束，免去齐燕铭、夏衍文化部副部长职务（部长沈雁冰为党外人士，保留名义）、成立以萧望东为书记、顾金生、石西民为副书记的新党组。

1963年8月，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毛泽东看到后，批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既把瞿秋白在狱中所写《多余的话》定案为背叛，并从此布置大抓叛徒。1943年间曾任刘少奇秘书的吕振羽神秘被捕。据黎澍的揭发：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之一。与会同志，特别是来自地、县、厂矿的同志纷纷反映各地实情并对中央工作中的指导错误提出严肃批评，但会议对于中央核心中的分歧（即站在第一线的中央集体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并未解决。随后，陈云几次讲到必须充分估计我国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提出不要只想到钢（以钢为纲）了。6月，彭德怀写长信给中央和毛泽东，请求全面审查他的历史，弄清性质，正确处理。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讲话，错误地批判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即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此为起点，在国内掀起了“反修防修运动”。党内一大批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不同意毛泽东错误主张的同志，便成为修正主义者和阶级斗争对象。当戚本禹发表批评李秀成自述文章后，史学界群起而攻之。中宣部令各地报刊不得转载戚文，并组织文章予以驳斥。戚本禹闻讯惶恐不安，准备写检查时，江青召见他转达毛泽东意见，说是戚文写得好，党内的叛徒问题多年以来没有解决。戚文提出了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江青还说，文章应当写下去，可找康生请教。于是在康生指导下写出来的戚的第二篇文章气势更凶，直接指斥彭德怀，兼及赫鲁晓夫，借以影射党内的“叛徒”和“修正主义”。毛泽东不顾公安部从1954—1964年十年间对瞿秋白被害案的审查结论，一反他过去对瞿的高度评价，把瞿说成是“叛徒”，也是为解决党内“叛徒”问题的现实斗争服务的。（《评陈铁键著〈瞿秋白传〉》载《书林》1988年第6期；参考陈铁键《秦城审戚本禹》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五期）

1964年6月，在康生策划下，开展对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所谓“合二而一”问题的批判。8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康生有意“引蛇出洞”，“开始象是学术斗争，我们有意识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讲话。”（康生1966年10月5日讲话）制造了“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杨献珍被撤去党校校长职务。毛泽东认为杨献珍这一纯理论的哲学表述是直接反对他的。他说：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讲哲学要从课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的痛处，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1964年下半年，开展了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围剿批判，康生，陈伯达说他是“中国最

大的修正主义者”。他的经济理论，较之苏联的利别尔曼更利别尔曼。同时受到批判的还有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在历史学领域内，孙达人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受到了毛的称赞。（6）

总之，在1962年到1965年间，毛泽东似乎已经感到亡党、失天下的危险已经近在眉睫，三分天下仅有其二，发展下去，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这个政权就要完蛋。应该说，毛泽东确是看到了某些隐伏在现政权下的危机和症候之所在的。在《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1965年1月29日）里，毛泽东提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把共产党特权统治制度下所滋生的官僚主义指为资产阶级的罪恶，这是栽赃行为，把他们归为阶级与阶级斗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但是，毛泽东的确看到了这个官僚特权集团已经形成并且迅速僵化、腐化。“他无力面对他所创立的政权中出现的某些严峻的事实，于是就创造出许多虚无的东西来解释为什么事情变得如此糟。第一个虚幻就是对六十年代中国阶级斗争的夸大。”（特里尔《毛泽东传》第394页）毛泽东不能、也不愿理解，正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与特权垄断产生了无可救药的腐化、丑恶的官僚特权集团，而他自己便是这个集团的代表和首领，然而他却把所有这些一古脑儿诿罪于虚妄的敌人的破坏。随着年岁将尽，他的担心与失望与日俱增。他执拗地认为，如果依照他58年大跃进的一套来做，中国是不会沦落到这番境地的。他最害怕的是斯大林死后的悲剧会在他死后重演。因此，他非常后悔自己在59年搞所谓一、二线，把党和行政大权交给了有赫鲁晓夫嫌疑的刘少奇之流。他相信，只是因为59年以来因自己“有意的”大权旁落，才使中国这条船转向了错误的航向。他认为：建国以来，自己唯一有责任的搞了一、二线的问题。他说：

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中央分一、二线，最早是在1953年底由毛泽东提出，但长期没有实行。）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起立，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插话：大权旁落。）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也不找我。62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后来四个人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在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4日）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作的不太好，就是一、二线的问题。搞一、二线，原来考虑我国的安全问题，并鉴于苏联国内外出现的问题，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搞一、二线。我处于第二线，别的同志处于第一线：刘、邓处在第一线。刘是副主席，一些主要的会议是刘主持的，邓处理日常工作。现在看来不好，结果搞得很分散，所以十一中全会把二线取消了。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我不主持，好多事让别人作，原想培养别人威信，考虑到我见上帝时国家不致发生大的震动。中央讨论时大家都赞成。后来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搞分散主义就不对了。……过于信任别人。这件事引起警惕是在制定二十三条时。北京的事连插针的地方也没有。我没办法，中央也没办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

为什么说我有责任？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再么，又过于信任别人了。引起警惕，还是廿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是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能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因为北京没有人办。（《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

年10月25日)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仍然多次就自己被架空而大发牢骚。他说：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

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

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没有公开化。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可能变颜色。这篇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经看出一些问题。六一年到六五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作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我们过去只抓了个别问题。个别人物。五三年冬到五四年斗了高、饶。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已是知道的，但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好几年，我就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嘛！毫无办法。《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去年就声明，《人民日报》我不看，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我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曾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败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在存在的，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5月1日）

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向我们表明，在毛泽东心目中最不能容忍的是在他退居二线之后，已经对实际政局丧失控制。他所以悍然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其直接的目的，就是把失去的实际权力再抓过来，由自己重掌国政，以便推行自己的理想路线，重新选定可以信赖的继承人，保证“千秋万代，永不改变颜色”，使自己的尸骨免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烧化。对权力无厌的争夺是在对虚妄的伟大理想狂暴追求的谎言下进行的。

第四卷 1965年11月24日至12月7日（毛泽东论反对折衷主义）

11月24日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在上海静观形势的发展。鉴于北京方面的抵制，他下令将姚文元文章印成小册子。上海新华书店给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发来征求订数的电报，要求请示市委宣传部后，速报订数。

11月12日至26日

全国各省报纸，除《北京日报》、《湖南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四家外，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等均先后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北京日报》社长范瑾电话向上海《文汇报》打听文章背景。张春桥严令封锁消息。经请示在外地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7）组长彭真，彭指示暂不转载。本月中，彭真回北京，指责上海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民盟负责人吴晗，“这样做，还要不要党的纪律？”发表这篇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文化部长周扬指责姚文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是勉强的。彭真也说：“《海瑞罢官》这出剧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

〔按〕在文革期中，所有彭真等当事人都说：他们对姚文的来头是不了解或了解不多的。其实这不符情理。据后来的许多报导，彭真清楚地知道姚文是由江青组织的。而江青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毛的观点，老于官场的彭，决不会如此无知幼稚。但是彭真仍然明知而硬顶，他是有所恃的。第一：姚文的发表，不符合组织手续与原则。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决定而发表的东西，只能认为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中央。北京各报可以不予转载。第二：彭完全相信，通过正当的组织程序处理时，他可得到刘、邓等的支持。邓对牌友吴晗的“罢官”，认为无足计较。他曾不无谑意的说：“等教授罢了官，好打桥牌。”其同情的态度，于此可见。刘对姚文的发表，态度比较持重，但支持也当然在彭一边。故彭真实有所恃而无恐。由此而更激怒于毛，事态益趋恶性发展。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起草委员会讨论时，彭真发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省市是不是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下卷第1026页）可证作为刘少奇嫡系的彭真62年七千人大会上，也是有账的。

〔按〕据罗瑞卿的女儿点点所撰《非凡的年代》所载：罗25日抵上海，“当时上海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父亲，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并告诉上海市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们转载不转载。”毛主席还交待了，“什么人都不许讲”。26日，“晚上父亲见到江青，江青也对父亲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回到驻地，父亲即给彭真同志打电话，他在电话中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罗瑞卿就姚文向彭真通报，可见两人关系的密切，也很可能就是毛泽东最后下决心先搞掉罗的原因。

12月7日

中宣部刊物《宣教动态》刊登《上海知识界人士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反映》，抨击姚文“后两段火气太大”，“批判提得太高”，是“政治上的罗网，陷人于罪”等等。以后，这个刊物一次又一次抨击姚文是“大棒子”、“文字狱”等等。

〔按〕姚文发表前三天，张春桥曾邀集上海学术界人士李平心、周予同等对姚文提意见。与会者均表反对。据江青指示：“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击、出场。这样反覆搞，他们非出马不可。前一时，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于是《文汇报》根据张春桥的指示，组织“放”。12月31日，又召集上海史学界、文艺界名宿周予同、周谷城、谭其骧、李俊民、李平心、陈守实、魏建猷、陈向平等座谈，以“引蛇出洞”。引蛇出洞以陷人于罪，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毛就曾经施用过。嗣后以向领导提意见为名的鸣放，如

61年间的神仙会，64年的三干会等等，都是以民主为诱饵，鼓励人“畅所欲言”，然后再秋后算账，进行政治打击。此即毛的所谓“民主”。

注释：

1. 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出版。其自序谓此书于1955年曾油印一百多本。
2.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75页。
3. 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载《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39页）“我们都认为主席不如总结革命经验，专从事理论著作为好。”这大概是中央大多数干部共同的心态。
4.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毛泽东主义的起源》。
5. 根据李锐的观察，毛泽东对马列著作，很少涉猎。毛泽东自己也招认，当1920年他开始转奉共产理论时，不过是从《共产党宣言》及李达等的通俗介绍中了解共产主义的常识，而他所取的还仅仅是其中所揭的阶级斗争这一概念。（《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第114页）。然而实际上，1920年时，毛泽东说他读过的三本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都还没有出版。因此，这个时候毛所知道的马列主义，实在太有限，这是无容否认的事实。
6. 参考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199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7.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夏，京剧现代戏会演之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的。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